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著

Aristotle

ATHENAION POLITEIA



汉阅学术文库

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 >

雅典政制

冯金朋 译



# 雅典政制

Athenaion Politeia

Aristotle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冯金册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典政制 /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 冯金朋译注.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1  
(汉阅学术文库. 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  
ISBN 978-7-5534-0680-0

I. ①雅… II. ①亚… ②冯… III. ①奴隶制度—历史—雅典 IV. ①D0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6949号

## 雅典政制

---

著者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译者 冯金朋  
出品人 刘丛星  
创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策划 崔文辉  
策划 猫头鹰工作室  
责任编辑 聂文聪 陈 僊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本 650mm×960mm 1/16  
印张 18.25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箱 [jlpg-bj@vip.sina.com](mailto:jlpg-bj@vip.sina.com)  
印刷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534-0680-0

定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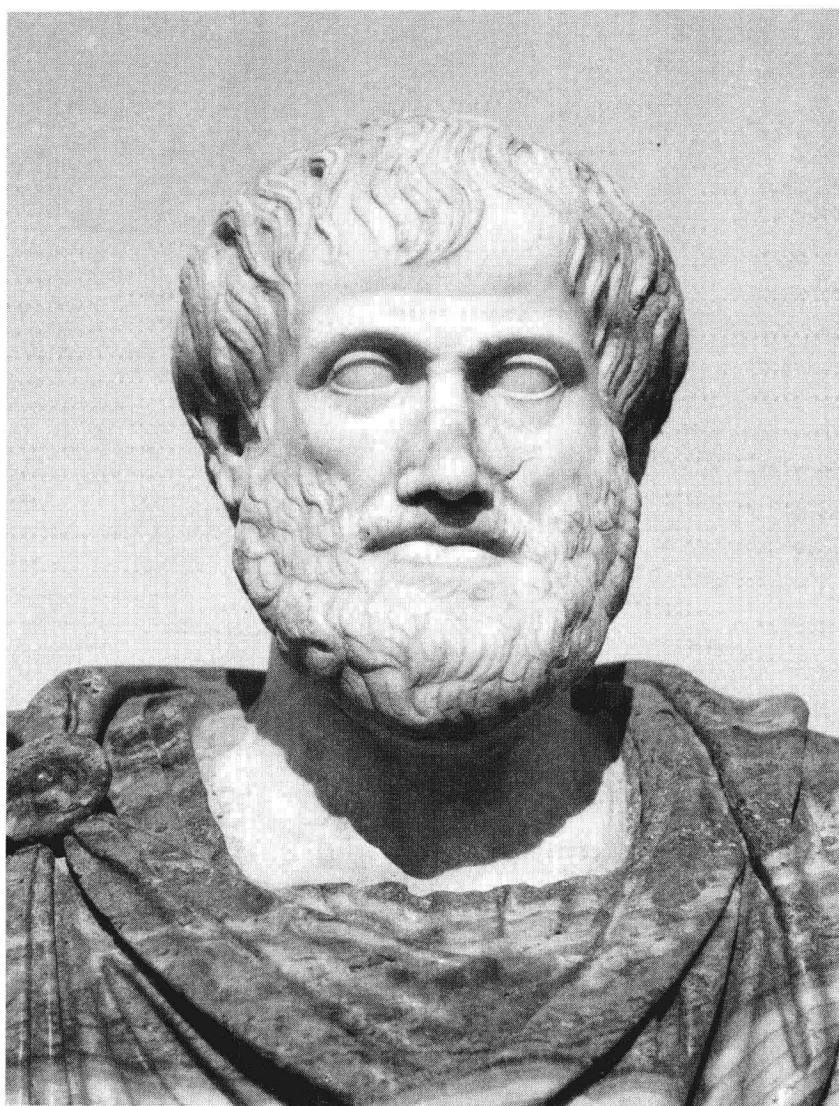


图1 亚里士多德（雕像）



图2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抄本片断

## 序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自成稿之日起，便显示出不容低估的学术价值。亚里士多德在写作《政治学》过程中，《雅典政制》是他的重要参考材料；四百年后，普鲁塔克在写作《名人传》中的《忒修斯传》、《梭伦传》、《客蒙传》、《伯里克利传》和《尼西阿斯传》时，曾直接或间接引用了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的篇章，尤其是关于梭伦的部分；两千多年后，当其抄本在 1891 年重见天日之时，学界普遍认为它将会引领西方古典学进入一个新纪元<sup>①</sup>，仅当年便出现了三种英文译本、三种德文译本、两种法文译本、一种意大利文译本及俄文译本，等等<sup>②</sup>。倘若恩格斯读了这本《雅典政制》（我们不能绝对肯定他没有读过），他会不会修正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我们无法确知；<sup>③</sup>但可以确知的是，它的确是阅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重要参考材料，也同样了解和研究古希腊政治制度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必备史籍。

---

① John J. Keane, *The Composition of Aristotle's Athenaiion Polite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

② J. E. Sandys, *Aristotle's Constitution of Athen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2, p. lxxxix.

③ 吴恩裕先生曾在商务本《雅典政制》的序言中认为，即便恩格斯看到了这本书，他也不会改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基本观点（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iv页）。

## 一、《雅典政制》的流传、散失与重现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前 322 年）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篇尾讲道，为了使《政治学》能够变成一部培养优秀政治家的经典，他搜集了许多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制度并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以便阐明“什么是最好的政体，它应该如何设置；制定何种法制，才能使它在最佳状态下发挥作用”。<sup>①</sup>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生活在公元 3 世纪）在记录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时，称他搜集了 158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sup>②</sup>，这个数字普遍被学界认可；不过，乌萨比亚（Usabia）认为它应该是 171 个<sup>③</sup>；据桑迪斯考证，其中有 99 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字有案可稽<sup>④</sup>。可惜的是，亚里士多德为写《政治学》所参考的这些史料后来全部遗失；幸运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史料《雅典政制》却在近两千年之后又被重新发现。

最初，《雅典政制》可能不是一部独立的作品，而是“政制汇编（the vast collection of Πολιτεῖαι）的一个篇章，古代作家几乎一致认为这个汇编出自亚里士多德之手”。<sup>⑤</sup>这部“政制汇编”在《政治学》完成之后，被存入了吕克昂（Lyceum，一译吕西昂）学园的图书馆里面；公元前 322 年，亚里士多德将吕克昂学园交给了他的得意门生忒奥弗拉斯图（Theophrastus）掌管，当然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也包括在内；忒奥弗拉斯图又在公元前 287 年将亚里士多德和他本人的著作传给了自己的学生涅留斯（Neleus），后者将导师所赠之物带到了小亚细亚地区。从此，亚里士多德连同忒奥弗拉斯图的这批手稿开始经历辗转与流失的命运。涅留斯把它

①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1180 a 20-1181 b 24.

②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v. 27.

③ P. J. 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ion polite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2.

④ J. E. Sandys, *Aristotle's Constitution of Athen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2, p. xxxvi.

⑤ Sandys, p. xx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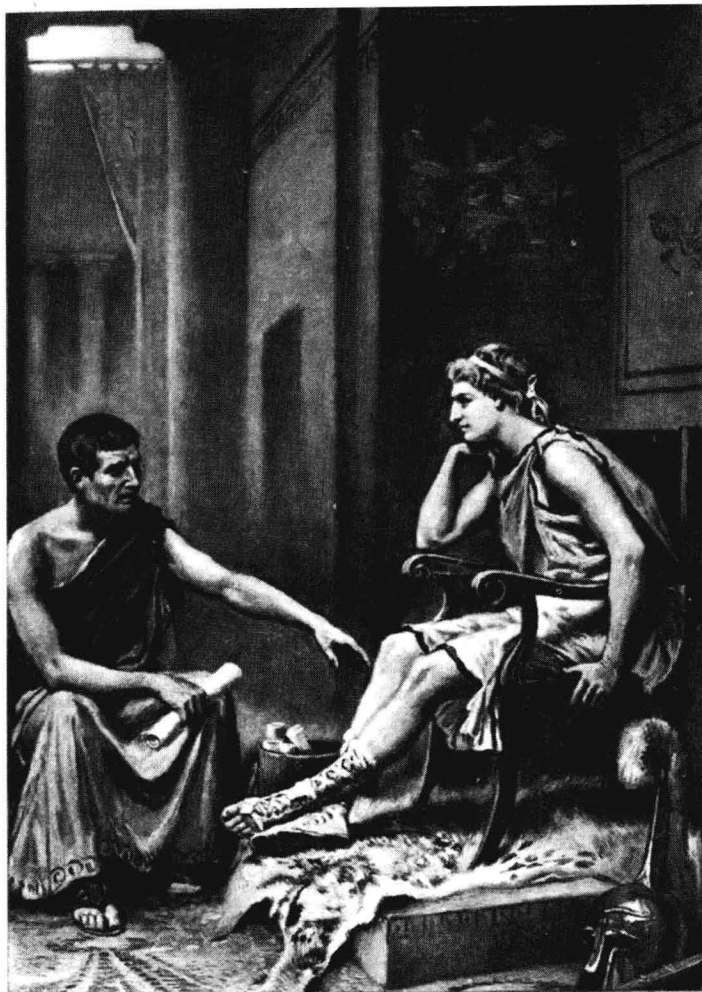


图3 亚里士多德在教导年幼的亚历山大大帝

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年出生于卡尔息狄斯半岛的斯塔基拉（Stageira），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私人医生。18 岁时，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在柏拉图学园求学，师从柏拉图二十载，并在柏拉图去世前后（公元前 348/前 347 年）离开雅典。公元前 343 年，他接受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聘请，成为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他的政治思想对亚历山大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元前 334 年，亚历山大率领三万五千人东征，不到十年光景便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帝国，几乎将希腊、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等四大古代文明全部囊括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们留传给子孙，而这些子孙们既无良好的文化水平又无强烈的哲学品味；在忒奥弗拉斯图死后三四十年，这批手稿被卖给了帕伽马王国（Pergamos）的国王们，送进了王室图书馆的地窖里，经受潮湿的侵蚀和蛀虫的啃噬。大约在公元前133年，它们又被提俄斯人阿佩利孔（Apellicon）获得，此人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信奉者。阿佩利孔发现其中有许多吕克昂学园未收藏的作品，他便将它们公布于众。公元前86年，雅典被攻占后，阿佩利孔的藏书又被送到罗马，它们在那里受到了礼遇，最后辗转到了罗德人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 of Rhodes）手中，他将它们按照不同主题分类编纂成套。<sup>①</sup>不幸的是，安德罗尼库斯编纂的这套亚里士多德文集在公元2世纪之后便遗失了。在安德罗尼库斯之前，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学者赫尔米普斯（Hermippus）也曾对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进行过编目，赫尔米普斯的目录被第欧根尼·拉尔修保存了下来，它是按照字母先后顺序排列的。第欧根尼·拉尔修提到，包括“158个城邦的政制：对民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和僭主制的一般或具体分析”在内的近400个篇目都是出自亚里士多德之手。<sup>②</sup>

“政制汇编”，尤其是其中的《雅典政制》，虽在影响上不及《政治学》，但是它在成稿之后仍然在一定范围内为人知晓和引用。公元前306年，阿提卡编年史家斐洛科鲁斯（Philochorus）在为阿里斯托芬的《马蜂》作注时，曾引用过《雅典政制》，并将其归名于亚里士多德。<sup>③</sup>其后的提迈乌斯（Timaeus）、斐洛斯特法诺斯（Philostephanus）、老普林尼、西塞罗、斯特拉波、普鲁塔克、阿忒那俄斯（Athenaeus）、哈尔伯克拉提昂（Harpocration）、赫拉克里德斯（Heraclides Lembus）等数十位对后世有影响的希腊罗马作家都曾经引用过“政制汇编”的内容。其中，普鲁塔克、哈尔伯克拉提昂和赫拉克里德都曾大量引用或摘录了《雅典政

① Plutach, *Sulla*, 26.1.

②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v. 27, 34.

③ Sandys, p. xxviii-xxix.

制》，并且哈尔伯克拉提昂的摘引文字多达 50 段。哈尔伯克拉提昂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文法学者，大概生活在公元 2 世纪；《雅典政制》或许在他之后便不见于世，后世学者只能通过先前这些作家的摘引来了解《雅典政制》。

进入 19 世纪，西方学者掀起了搜集亚里士多德作品残篇的热潮，搜集《雅典政制》残篇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1827 年，纽曼（C. F. Neumann）在慕尼黑出版了《亚里士多德政体论残篇》（*Aristotelis Rerumpublicarum Reliquiae*），其中收录了 59 段《雅典政制》残篇；1848 年，卡尔·缪勒（Carl Müller）在巴黎出版的《希腊历史残篇》（*Fragma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收录了 74 段《雅典政制》残篇；瓦伦丁·罗斯（Valentine Rose）在《亚里士多德伪书》（*Aristoteles Pseudepigraphus*）的不同版本中，将这个数目从 1863 年的 89 段提高到 1886 年的 91 段。

在瓦伦丁·罗斯努力搜集《雅典政制》残篇的过程中，相关的考古发现也取得了重大成果。1880 年，在埃及法雍（或译“法尤姆”）地区阿尔西诺城附近出土的两片纸草文书，被收藏在了柏林的埃及博物馆中，它们记载了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及其之后的情况。更大的考古发现是在十年之后取得的，1891 年 1 月 19 日，《泰晤士报》刊发了一篇爆炸性新闻，大英博物馆收集到了一份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纸草抄本，它也是从埃及出土而来的；仅仅在 11 天之后，1 月 30 日，该图书馆管理员科尼翁（F. G. Kenyon）编辑整理的希腊文本公开发表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份纸草抄本并未完整抄录《雅典政制》，它没有开篇文字，最后一部分严重破损，大约有 63 章的内容可以被学者轻松识读。

## 二、现代学者对《雅典政制》的注疏、修补与研究

科尼翁整理的文本一经刊出，欧美各国的古典学者纷纷对其进行注疏、翻译、复原和研究。虽然认为《雅典政制》的出土将西方古典学带入了一个

新纪元的观点有夸张之嫌，但可以完全肯定，它的确将雅典宪政史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19世纪的那些雅典宪政史著作在当时学界无论闪耀出何等光芒，都在《雅典政制》出土之后，尤其是希格内特《雅典宪政史》出版之后变得极为暗淡；对当代学界而言，它们只剩下了学术史梳理上的价值。

就英语学界而言，科尼翁和桑迪斯（John Edwin Sandys）两位古典学者在《雅典政制》的注疏和复原上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891年，科尼翁不仅对《雅典政制》抄本的63章的内容进行了编辑出版，还随后出版了第一个注疏本和英文译本，第二年又出版了一个修订版的注疏本，科尼翁的这些工作为日后的《雅典政制》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紧随科尼翁之后的是桑迪斯，他的重要贡献也在于对《雅典政制》的注疏。桑迪斯分别在1893年和1912年出版了一个注疏本及其修订本，他整理的希腊文本在细节部分与科尼翁的有所不同，并且引用了更为丰富的学术著述来辅助对《雅典政制》原文的阅读。同时，桑迪斯的另一大贡献是他对抄本的残缺部分进行了修复，使第六十四至六十九章的绝大部分内容可以被人识读。

最后剩下的极为残缺的第六十七章第四节至第六十八章第一节的内容，后来又被柯林（G. Colin）和霍默尔（H. Homel）两位学者复原，他们的劳动得到了罗德斯（P. J. Rhodes）的尊重，这在他1984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译本中得到了体现，它是迄今最为完整的英译本。同时，罗德斯还在注疏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1981年出版了《〈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注疏》，全书近800页，正文分为序言和注疏。在序言中，作者分析了《雅典政制》的考古发现，它的篇章结构、行文风格、成稿与修改以及亚里士多德和《雅典政制》的关系等；在注疏中，作者吸收了1981年以前的学术研究和考古发现成果，弥补了科尼翁和桑迪斯注疏本中的不足，并纠正了先前学者对文中某些篇章或术语的错误理解。总而言之，罗德斯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学术史上又树立了另一座里程碑。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我们发现比《雅典政制》文本更难复原的是历

史真相，这集中在作者身份和成书年代上。

尽管公元前 1 世纪的伊壁鸠鲁学派学者斐洛德墨斯 (Philodemus) 指出，有一部分“政制汇编”并非出自亚里士多德之手，但他未具体列出这些篇章的名称。<sup>①</sup>除了这个不能确定的质疑之外，古代作家一律认为亚里士多德是《雅典政制》的作者，直至近代学者搜集其残篇的过程中，这一置疑又被重新提出。罗斯在《亚里士多德伪书》中写道，亚里士多德“既没有写这些作品，也没有写这些作品的意图”；同时，它也不是忒奥弗拉斯图所写，而是由某个不著名的逍遥派学者完成的，这个人可能是德米特里乌斯 (Demetrius Phalereus) 或狄卡俄库斯 (Dicaearchus)。<sup>②</sup>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抄本出版之后，关于作者身份的问题也成为了一个学界长期热议的话题。学界逐渐偏向于认为《雅典政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并在作者是“亚里士多德的某个不知名学生” (an anonymous pupil of Aristotle)<sup>③</sup>上达成共识；并且，它极有可能是在亚里士多德指导下完成的，因为《雅典政制》和《政治学》都明显表现出对贵族统治或精英政治的偏爱。但是，至于它具体出自何人之手，至今仍无一个权威结论。

关于《雅典政制》是何时写成或编成的，现代学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论，但普遍认为：它是在公元前 332 年至前 322 年的某个时间段内完成的，或许前后进行过修改。<sup>④</sup>《雅典政制》第五十四章第七节提到科斐梭芬 (Cephisophon) 担任执政官，这一年是公元前 329/前 328 年；第四十六章第一节提到了四列桨舰而未提到五列桨舰，五列桨舰是在公元前 325/前 324 年首次成为雅典海军战舰的。由此可知，《雅典政制》一定是在公

① Cicero, *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 2. 35.

② Sandys, p. li.

③ C. Hignett, *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Oxford: Clarendon, 1952, p. 29;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rans., by P. J. Rhod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4, p. 9.

④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rans., by P. J. Rhod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4, p. 32.

元前 329/前 328 年之后，或许是在公元前 325/前 324 年之前完稿或修订的。另一个可能的时间下限是公元前 322 年。雅典在这一年失去了对提洛岛的控制，无权再向该地派驻官员。<sup>①</sup>同时，亚里士多德也在这一年被迫离开雅典，并很快去世，他的《政治学》也未能最终完成，而他的弟子也没有对其进行续写；由此可见，收集和整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史料的工作也就此终止。<sup>②</sup> Rhodes 还进一步认为，《雅典政制》在完稿过程中经历过修订，例如第四章所讲的德拉古改革便是后来增添到初稿中的内容。<sup>③</sup>从行文逻辑上判断，第二章和第五章之间有着明显的承接关系，而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存在却割裂了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

### 三、对《雅典政制》重新翻译和注释的意义

相对西方学界而言，我国对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研究取得的最大成绩是出版了两个颇具影响的中译本。日知、力野两位先生早在 1957 年将罗布古典丛书的《雅典政制》翻译成了中文，由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颜一先生后来又根据同一版本将《雅典政制》重新翻译成中文，其译文被编辑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十卷）。<sup>④</sup>

① 参见：Aristotle, *Athenian Politeia*, 62.2。

② 穆尔认为，《雅典政制》的成稿有双重目的，它既是为写作《政治学》作准备，又有日后独立成书的意图（J. M. Moore,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 144）。

③ P. J. 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ian Polite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2-57.

④ 日知（即我国史学大家林志纯，1910—2007 年）、力野先生所译的《雅典政制》最初以《亚里斯多德的“雅典政制”》为题发表于《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 年第 2 期，同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出单行本，此单行本 1959 年又被商务印书馆收录“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刊印，并于 1999 年再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于 2011 年 1 月又再一次再版；本书所引日知、力野的译文来自 1999 年商务本（〔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并将其简称为“商务本”。颜一（学者，1964—2004 年）先生的译本又被收录在了在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转下页）

这两个分别来自历史学界和哲学界的中文译本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它们的影响力使得本书的出版面临着狗尾续貂的尴尬境地，但它毕竟也有自身的价值。不管是从译文还是从注释来看，本书都有其独特之处。

第一，本书参考了多家希腊文校注本和英译本，尽可能准确地转述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使读者了解《雅典政制》到底写了什么。笔者以科尼翁 1892 年版、桑迪斯 1912 年版、拉克汉 1938 年版和罗德斯 1981 年版四个希腊文校注本为基本依据，并以科尼翁 1928 年牛津<sup>①</sup>、拉克汉 1938 年罗布古典丛书版、穆尔 1975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版和罗德斯 1984 年企鹅版的英译本为重要参考，进行比较综合之后，才完成了本书的译文<sup>②</sup>。

第二，本书将《雅典政制》中表述简略或模糊以及应写而未写的内容，以注释形式进行补充，适时地辅助读者阅读。笔者将古典文献与现代研究成果相结合，以《雅典政制》的行文为主线辅以适当的注释文字，使读者对雅典的政治制度演变历程、雅典民主制在公元前 5 和前 4 世纪的运行情况、古希腊政治格局及其演变历程、古希腊人的政治观念等都有了一些了解；这些背景知识，反过来或许有助于读者更透彻地研读《雅典政制》。

（接上页），本书对颜一译文的引用皆来自《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十卷），并将其简称为“颜一本”。两种译本皆是以哈佛大学出版社罗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或译“洛布古典丛书”等）中的拉克汉希英对照本（H. Rackham,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Aristotle*, XX,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为母本翻译而成。除了这两个译本的作者之外，黄松英先生在《雅典政制》的介绍方面做出了贡献，他所撰写的小册子《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在 1983 年 4 月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以油印本形式发行，后来的两篇文章《亚里士多德与〈雅典政制〉》和《雅典政制》分别被刘明翰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和《外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收录。

① 本文所引科尼翁译文皆出自：F. G. Kenyon, *Atheniesium Respublica* (in *Th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10,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W. D. Ro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所引科尼翁注文若无特别注出，皆来自：F. G. Kenyon, *Aristotle on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2, 该书在本文被缩写为“Kenyon”。

② 就当前两个中文译本而言，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其他原因，译文中出现不下百处错误（何元国，《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汉译举误》，《安徽史学》，2011 年第 6 期，第 69 页）。

第三，本书尽可能地对《雅典政制》中错误的记载和有争议的文字进行辨析，使读者阅读时能够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获得来自《雅典政制》却又超越《雅典政制》的知识。“《雅典政制》不是一部杰作，它出自平庸之手”<sup>①</sup>，这一评价确不为过。尽管这部作品经历过修改并且有可能单独成书发表，但它终未能改变史料汇编的性质，并且仍然是一部文史混杂、未经精心考证的史料汇编。例如第二十四章第三节所述观点“来自盟邦的盟金、税收和捐献，能够维持超过两万人的生活”，有待进一步商榷；笔者以注释形式对作者所列数据逐一进行溯源和分析，来说明它们的不可靠或不准确，以供读者参考和选择。

第四，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搜集、阅读了部分相关的古今文献<sup>②</sup>，并将其融汇到本书的注释中。如果您阅读本书时对其中的某个具体方面感兴趣，或许笔者所引用或参考的文献能够为您的延伸阅读提供线索。

最后，本文还收录了《色诺芬雅典政制》。一方面，它的出现有助于更好地阅读《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另一方面，将两部著作放在一起阅读，或许更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雅典城邦的宪政沿革。

总而言之，笔者完成本书的最终目的，使它既可以成为古希腊政治史特别是雅典城邦宪政史爱好者的一本入门读物，又能够成为相关研究人员可资借鉴的参考书。然而，笔者毕竟学力浅薄、见识鄙陋，文中所述必有谬误。恳请读者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来阅读本书的译文和注释，更恳请方家不吝赐教，以使本书进一步完善。

---

①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rans., by P. J. Rhod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4, p. 33.

② 笔者只能用“部分”一词来形容本文所引文献，《雅典政制》相关的文献尤其是现代研究成果，每年都会成批出现；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不断地搜集材料，但“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无法将所有相关文献全部搜集，更无力将其全部阅读和吸收。



# 内容提要

## 上编 公元前403年之前的政制演变

### （一）伊翁时代

残篇一 最初实行的君主制。伊翁回归雅典之后，国王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

残篇二 潘狄翁的王国被四个儿子分区域继承。

### （二）忒修斯时代

残篇三 忒修斯重新统一阿提卡。

残篇四 忒修斯废除君主制，实行民主制。

残篇五 忒修斯将阿提卡进行行政区域划分：四个部落、十二个三一区或胞族、三百六十个氏族。

残篇六 忒修斯被杀，其尸骨后来被运回雅典。

残篇七 世袭君主制终结。

### （三）库隆政变

残篇八 库隆政变被墨迦克勒斯镇压。

抄本第一章 阿尔克迈翁家族受审，污染被清除。

### （四）德拉古改革

第二章 雅典社会因债务问题而陷入重重危机。

第三章 德拉古时代前的政治制度演变。九执政官制的逐渐形成，根据